

轻松而凝重的“假如”

——我的学术反思录

□陈漱渝

古今中外的“假如”话题

“假如”是汉语虚词类其中的一个连词,表现假设前提或虚拟条件。在一定场合,也用作动词或名词。在我的青春岁月,流行一首普希金的抒情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须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

上述译文的译者是戈宝权。这首诗还有查良铮译本和许渊冲译本。因为戈译比较便于朗读,曾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戈先生曾任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的顾问,所以我向他请益的机会很多。戈先生晚年患帕金森综合征,被病魔折磨多年。他跟查先生在不同方面,都曾被生活“欺骗”。查先生曾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我1957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时,在图书馆的墙上看到过不少批判他的大字报,但不知道他就是诗人穆旦。许先生被誉为“中外文明的摆渡者”,享年一百岁,而查先生逝世时才59岁。

我一度认为,“假如”是一个很轻松的话题。比如,英国诗人拜伦,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也是青年鲁迅大力推崇的“摩罗诗人”。1824年4月19日,他因参加希腊民族解放运动病逝,终年仅36岁。在西方,“假如拜伦还活着”是一个持久热议的话题:在生活方面,拜伦虽然跋足但风流倜傥,有人认他如活着可能跟妻子安娜贝拉正式离婚,并制造出更多的绯闻;有人认这位世袭勋爵可能仍然愤世嫉俗,但也可能成为一个寄生虫般的老头。在创作方面,他可能续写他的长诗《唐·璜》,也可能转向撰写小说或研究哲学。在政治方面,这位英国上议院的议员可能重返英国政坛,也可能成为希腊独立之后的一位政治领袖。总之,不同假设者之间虽有意见分歧,但并没有相互攻讦,而是各抒己见。

在古代诗词中,“假如”的意思常用“若”“倘”或“向使”来表达。如白居易

《放言五首·其三》:“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大意是:假使周公和王莽这两个人当初就死去了,他们或忠诚或奸佞的真相又有谁知道呢?

在中国白话诗创作史上,以《假如》为诗题的作品更多,比如顾城的《假如》,席慕蓉和汪国真的《如果》,恕不一援引。

在当代流行歌坛,也有很多带“假如”二字的歌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演唱的《假如你要认识我》。这首歌创作于1979年,流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歌中那种向往美好、奋发进取的精神,真实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气质。

凝重的“假如鲁迅还活着”

然而,假如提出“假如鲁迅还活着”,话题就变得凝重。人们常提及1946年鲁迅逝世十周年之际,上海《文艺春秋》杂志3卷4期开辟了一个《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专栏,刊登了萧乾、臧克家、田汉、茅盾等十五人的来稿。当时抗日战争刚结束不久,内战一触即发。《文艺春秋》展开这场讨论,是为了继承鲁迅精神遗产,表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时代心声。

在我的记忆中,最早提出这一“假如”的是鲁迅夫人许广平。1941年10月18日,她在《上海周报》4卷17期上发表了《如果鲁迅还在》一文,以纪念鲁迅逝世五周年。许广平认为,如果鲁迅活到当年,团结抗日的大目标绝不会改变。如果鲁迅挥击的时弊犹存,那说明社会没有多大进步,是鲁迅的不幸。

继许广平之后,提出这一假设的是胡风。1942年9月15日,胡风在《文学月刊》(桂林版)1卷1期发表了一篇《如果鲁迅活着》。当时抗日战争早已进入相持阶段,战争的长期性是确定的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胡风当时生活在国统区,耳闻目睹了统治当局一方面“高兴到乌托邦里去寻求‘胜利’”,把斗争的新的开始当作斗争的终结,“聊快一时的人心”;另一方面又不允许对社会

上还存在黑暗和愚昧的状况予以揭露。这时胡风想起鲁迅生前对他讲的一句话:“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命运会堪忧,这是我相信的。”然而,如果鲁迅依然批判武汉、重庆、桂林存在的阴暗面,那就会“有人要把他当作汉奸看待的”。

从许广平1941年和胡风1942年提出的上述“假如”,以及1946年《文艺春秋》进行的那场讨论,说明鲁迅的文化遗产并非僵死的化石。鲁迅仍然活在读者心中,和我们一起思考中国的前途,中国人的命运。

有人提出,那位1881年9月25日在绍兴出生的周樟寿(鲁迅原名),确实已于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去世。因此,对于他逝世之后进行的种种“假如”,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属于逻辑学中的“伪命题”,只能通过无效推理,产生思维中的“黑洞”或“乱码”,“什么意义都没有”。

不过也有人认为,对于“伪命题”的理解本身就存在学术争议。有的“假如”确实毫无价值,但在人文和艺术领域中,有些有价值的“如果”,类似于逻辑上的“假言命题”。虽然“如果”这个条件并不存在,但是所断定的事物还是具有一定的推理依据。对这类“如果”从不同角度进行推断,目的并非寻求一个确切的答案,而是通过在讨论中发生的思想碰撞,揭示出某些更为深层的问题。要是讨论“如果鲁迅活到今天”这种问题“什么意义都没有”,那么许广平、胡风、茅盾等充满人生智慧的前辈,为什么在不同的历史转折时期还为此反复进行思考和论述呢?

对这两种看法,我至今仍感莫衷一是,但我却在并无充分的学术准备和精神准备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做了这种事情。1998年,正值中韩建交6周年,“韩中友好基金会”邀请我去参加“韩国第一届鲁迅文学颁奖活动”。该基金会理事长李宗灿让我发表一次演讲,规定的讲题就是《鲁迅与21世纪的对话》。因为当时20世纪即将结束,21世纪的序幕将徐徐拉开。韩国是最早译介鲁迅作品的国家之一,他们希望在不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形态多元并存的世界格

局中能受到鲁迅文化遗产的启示。这个讲题当然带有“如果”性质,但听众不多,事后没听到任何反响。

一个不无意义的命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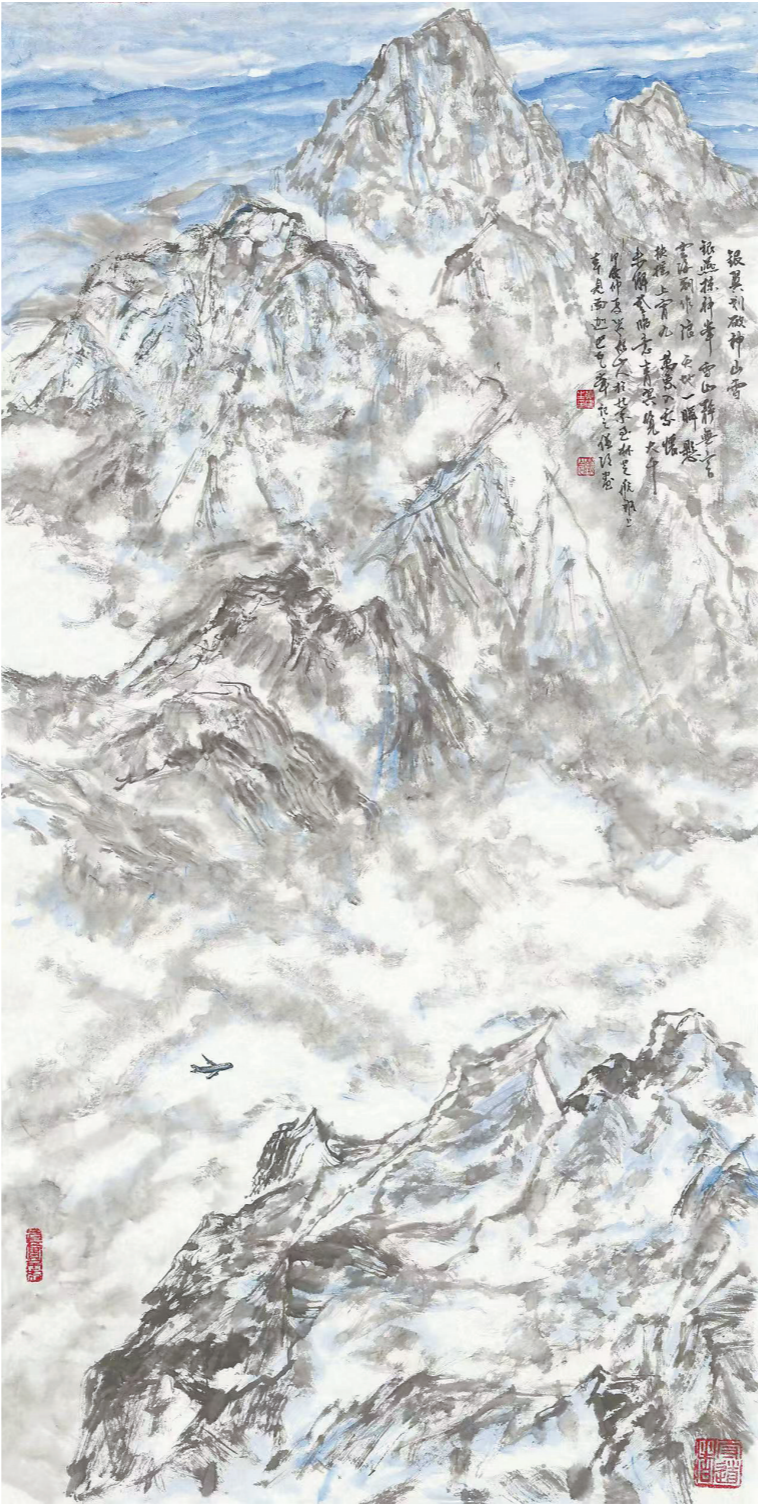
我现在对这一问题的认知是,“假如”这一命题在鲁迅研究领域并不是禁区,而是可以成为一种思维工具。鲁迅的新编历史小说《故事新编》就是通过古今杂糅的手法,让现代人穿“古衣冠”,让古人说“现代话”,终极目的其实还是借历史话题发表自己的现实感悟。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从诠释学的角度,提出历史语境与现实条件是可以相互作用的。通过不同视域的交流,可以形成一个新的理解视域,从而可以通过现代诠释加深对文本原意的解读。

当然,但凡人活着,他的思想就不可能不随时代而变迁,既有其一贯性,也有阶段性。不能设想鲁迅活到21世纪20年代,其思想还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但是,作为传统载体的经典作品,在流传过程中会呈现出恒常性的形态,既能回望“去路”,又能瞻望“未来”,即使在虚拟情境中,仍然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对于现实情境中的导向性。所以,虽然包括鲁迅在内的不少经典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希望自己尽快被人们遗忘,但他们的精神背影却随时光的流逝而益显高大。

记得德国诗人席勒创作了一首经典诗作《大钟歌》,同时代诗人歌德在《席勒大钟歌跋》中写道:

“我们全都获益不浅,
全世界都感谢他教诲;
那专属于他个人的东西,
早已传遍人类。
他像光华四射的彗星,
把无限的光芒同他的光芒融汇。”

鲁迅就是中国这块曾经饱经忧患的土地上产生的世界性作家。他的经典之作跟席勒、歌德一样传遍人类。他的思想光芒穿越时空的雾障,能回应当代人的关注和困惑,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经厉时代性变革时的指针。所以,“假如鲁迅活着”,虽然我回答得不尽如人意,但还是一个不无意义的命题。



银翼划破神山雪(国画)

□黄健生

2025年12月28日-2026年1月8日,《背着画架闯藏地——黄健生西藏写生展》在广州陈树人纪念馆开展。

“暴力美学”不一定“美” 更不是“学”

□袁征

早几天看到一篇文章,说某部电影是“暴力美学的天花板”。这是过去好多年经常看到的讲法。不管在微信上,还是在其他网络媒体上,大家都很难避开类似字眼,慢慢就习惯了。不过我突然想弄清“暴力美学”是个什么东西。

那个讲法太奇怪。大家平常说什么“学”,是指各种理论。例如,化学是关于物质结构和变化的理论;天文学是研究天体的理论。“暴力美学的天花板”呢?是研究暴力美最顶尖的理论吗?不像。

“暴力美学”应该是个错误的翻译。英语里确实有Violent aesthetics之类讲法。但同一个词可以表示不同的概念。Aesthetics既可以表示“美学”,也可以表示“美”。Violent aesthetics讲的是暴力的美,而不是暴力美学。也许夸耀暴力的人心里不那么踏实,就给不是研究学问的电影加上个“学”字,好像因此有了深奥的理论,不得随便怀疑。

在中国,一篇比较早讲“暴力美学”的论文说:“它主要指电影中对暴力的形式主义趣味。”下定义最标准的做法是“属加种差”;说一种事物是什么的时候,讲出它的上级概念,并讲出它跟其他同级概念的差别。例如“环境美学”是研究人与环境关系的审美哲学。那就是说,“环境美学”是一种“审美哲学”。但“趣味”显然不是“暴

半吊子“文痞”

□漠道

乡下的四叔喜欢给我们这些读过几天书、写过几个字的人起外号。他咧着嘴,露出两颗门牙,总把我们叫作“文痞”。有一回我实在忍不住,和他理论,说写文章是正经人做的正经事,是用文字给世道人心画像。四叔“嘿嘿”地点了点头,又笑了笑,算是让步。按他的说法,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耍笔杆子,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还算不上真正意义的“文痞”,就在“文痞”前加上三个字——“半吊子”。

这个称呼不久便成了熟人圈里的口头禅。而我和两位朋友的日常,竟成了这五个字最鲜活、最酸涩的左脚——

一位是我的同门师兄。从高中起,他就迷上了诗。参加了工作,更是没有停过笔。后来他在报刊上发表了几首不长不短的诗,还得了一张据说含金量不低的奖状。这下可了不得,那点星火在他眼里竟然成了冲天大火。他只管做“寥廓诗人”,工作是俗务,家庭更是累赘。妻子苦口婆心的劝告,在他看来成了扼杀灵感的唠叨。争吵多了,结局是妻子带着一身疲惫和无奈,投娘家去了,留下他独守门户。

我曾去过一次他家。推开门,一屋子的凌乱。厅子正中央摆着大书桌,最显眼、最干净的位置供着红皮金字的作品获奖证书。证书两旁是狼藉的书本、写废的稿纸。他每日在这“战场”上,写罢即唱,唱完又写,歌声嘶哑苍凉。或许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超迈,可我总觉得有种说不出的酸腐。

另一位是我的高中同学。年轻时家境殷实,不必为生计奔波。可他心

里装的不是生活,而是纸上诗行。他从不屑干家务,半辈子光阴献给分行的句子。命运却似未给他同等回报。如今已过知天命之年,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便长年漂泊在社交平台,每天在朋友圈发他新写的诗作,努力营造自己的意象与意境。可是,溅不起半点水花。除了我们几个旧相好出于礼貌点赞,真正的读者并不多。

父母去世后,他那颗被文学填满的心成了一种顽强的执念:将诗稿结集自费出版。他耗尽最后的积蓄,印了几百本诗集,封面是显眼的亮黄,序序者是当地的显贵,书名起得极夸张,仿佛囊括天地宇宙。他给我们每人寄了一本。那本书还立在我书架上,和其他书摆在一起,格外扎眼。

看着我这两位朋友的境况,妻子半真半假地对我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瞧你交的这些朋友!说不定你们仨正好来个‘桃园结义’,组成拜把兄弟好了!”这句话像把鼓槌,敲得我心头打颤,赶紧把自己的天真烂漫收敛起来。

不知不觉间,我和妻子年纪大了。如今,她常对着镜子叹气,抱怨皱纹多了,头发花白了。有一天她忽然想起旧话,笑着说:“现在适合回忆和做梦了,你可多点弄弄笔头喽。”看着她,我心里涌起复杂的酸味与宽慰。也在这之后,我才敢光明正大地打开电脑,尽情地写点东西。但写下的不再是年少时飘在云端的诗,而是这些年沉在泥土里的、关于“文痞”和“半吊子”的人与事。

父亲的手

□张薇

父亲的手仍温暖,他仿佛睡着了。他在等待我来握它吗?应该是的,那双原本丰满的大手被病魔折磨得瘦骨嶙峋。

就是这双手把我抚养成人。我的祖籍是江苏南通的包场镇,父亲是教师,很忙碌,晚上还要在办公室坐班,没法带娃,只得把我送到奶妈家,周末再把我接回来。孩提时,寒冬腊月,我的手冻得又红又肿,父亲使用那双大手给我暖手。后来母亲调到麒麟医院工作,父亲省吃俭用半年买了一辆自行车,每周末带我去看母亲。后来我随母亲到麒麟镇读小学二年级,父亲经常接我们回包场镇自己家过周末,我坐前面的横杠上,母亲坐后座。在高高高低、坑坑洼洼的乡下路上骑行,太颠簸,要过好几座小桥,有几次差点把我们连人带车一起摔到河里。

年老后他跟别人说起我,总是说我是他“从小带大的”,边说边手掌向下,从下到上比划一下,语气里颇有点自豪。

我的初中高中都是在县城海门度过的,在江苏省海门中学读完中学,考

上南京师范大学。消息传来时,父亲正在炒蚕豆,闻讯后笑开了花,手翻炒得更带劲了,挥舞着,仿佛指挥家在指挥欢乐的曲子。

结婚生娃后,我因为要到华师大读研究生,把女儿托给父母亲带。父亲每天骑自行车送我女儿上幼儿园,自行车的后座上绑着小椅子给孩子坐。逢到刮风下雨天,不太好骑,父亲索性一路推着车行走,就这样帮我带了三 years 娃。

父亲喜欢跳舞,有时跳交谊舞,有时自创一套动作,那双大手在空中飞舞,时而呈托举状,时而呈推波浪状,手臂收放舒缓,姿势优美。在我女儿大婚的仪式上,他欣然跳上舞台,自由式舞了一圈,事先司仪没有安排这一环节。他那挥舞的大手传达着无法克制的喜悦。

就是最后躺在病床上插着胃管和氧气管,精神好一点的时候,他的两只手仍然会轻轻舞动,他对生的眷恋、对生活的热望浓缩在这举手之间。

父亲双手的温暖,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微小说

原则

□朵拉[马来西亚]

“我快被气死了!”何美丽站在苏米拉面前,双手抱胸,眉头皱得能夹死一只蚊子。

“又来!”苏米拉无奈地摇头,她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她把手中的咖啡杯往桌上一放:“你不要讲,我不要听。”

何美丽毫不在意,依然自顾自地吐糟:“我写的律师信送过去了,他们倒是回复了,但你猜怎么着?他们说什么系统排队,轮到的时候自然会通知!屁啦,明明是在应付我!”

“那你直接找人问一问呀!”苏米拉叹了口气,“有时候,关系比律师信管用。”

“我不想靠关系!”何美丽倏地提高了声音,“凭什么?我每个月交管理费,服务难道不是他们应该提供的?”

“是啊,但你忘了吗?”苏米拉耸了耸肩,“你在一个一切靠关系都能快半步的地方,非得坚持规则,结果就是吃亏。”

何美丽瞪了她一眼,不服气地拿出手机,一边翻通讯录一边嘀咕:“我就不信!”

接下来的几周,何美丽像是打了一场持久战,频繁地打电话、发邮件、提交各种证明。结果每次得到的答复都差不多:“我们会尽快处理,请您耐心等待。”

耐心?何美丽的耐心早就耗尽了。

又一个雨夜,她拖着湿透的鞋子回家,愤愤地甩掉外套,给苏米拉发语音:“我真是活该!不靠关系,就没法获得一个有顶篷的车位!偏偏这雨季,每天上下车都淋到浑身湿漉漉。”

第二天,苏米拉的电话来了,带着几分得意:“你昨天骂完我,今天还有精神吗?听我一言,打电话给我那个表哥吧,他就在那家物业公司管事。”

何美丽沉默了一会儿,仿佛在和自己的坚持作斗争。

“美丽,这不是输赢的问题。”苏米

拉语气放缓,“生活里有些事,不是你努力就能搞定的。规则固然重要,但学会灵活点,也不是什么坏事。”

何美丽最终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

一个星期后,物业经理亲自打来电话,不仅给她安排了停车位,还特别道歉了几句。

她打电话给苏米拉:“我靠关系了。”

苏米拉的笑声从听筒里传来:“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简单多了?”

她轻轻叹了口气:“简单是简单了,但我还是觉得不爽。”

“那你继续不靠关系试试?”

何美丽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还是算了吧,先让自己省点心。”

电话挂断后,她站在那块干干净净的地面上。这块干燥的区域,本该轮不到她,是几天前无数个雨夜里,她求而不得的奢侈。此刻,它却是她用最不屑的方式换来的妥协的战利品。

风从耳边掠过,像低声告知:门从来都开着,只是不欢迎干净的人。

她握紧钥匙,感受到钥匙硌在掌心的疼痛。唇角微微一抬,却不是笑意,而是一种嘲讽,是对自己的,更是对她一直信仰的那套公正规则的。

那些被反复强调的“规则”,原来只是用来安抚在队伍中耐心等待的人。而真正着急的人,早已越过长队,走了另一扇门。

远处传来几声短促的车笛。她回头。

雨点落在地面,迅速散开,没有声张。

她撑起伞,慢慢朝旧车位的方向走去,要去把车子开到这个新生的、不干净的车位。

原来,“关系”这两个字,从不张扬,却从未缺席。它像一把无形的伞,轻轻覆盖了所有坚持原则的正直和不甘。